

引文格式: 邵凯欣, 秦桂芬, 李明辉. 新时代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构建逻辑研究[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 18(0): 1-6. DOI: 10.12371/j.ynau(s).202403154

新时代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构建逻辑研究

邵凯欣, 秦桂芬, 李明辉*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昆明 650201)

摘要: 新型农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 主要是指具有较高生态文明意识、能够与时俱进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改进农业生产水平的农民群体, 其主要意识基础一般由生态文明意识、现代化意识、文化接受程度等方面构成。其中生态文明意识成为这一群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种意识的构建逻辑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经历了漫长的演变, 在有着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 经过国家政策在潜意识上的逻辑构建和自身对于社会发展形式的掌握而逐渐搭建起完整的生态文明意识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完善。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在构建逻辑上经历了萌芽、觉醒、奠基三个阶段, 伴随着国家政策指向的底层逻辑框架构建。在萌芽阶段后, 国家层面的指向引导开始转而成为个人意识觉醒的“催化剂”从而构建起完整、可持续的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当下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正是处于萌芽阶段, 国家政策的指向和生态道德的“遗传”对于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至关重要。

关键词: 新型农民; 生态文明意识; 逻辑构建

中图分类号: D 422.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A Research of New Farmer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ogic in New Era

SHAO Kaixin, QIN Guifen, LI Minghui

(College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China)

Abstract: The new farmers, as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mainly refer to the farmers who have a hig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can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y using modern technical means. Their main consciousness is generally compose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modern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acceptance. Among them,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ymbols of the awakening of this group.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is consciousness is affected by many aspects and has experienced a long evolu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idea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through the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the subconscious and their own mastery of the form of social development, a comple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has gradually been built up and constantly upd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收稿日期: 2024-03-29 修回日期: 2024-05-04

基金项目: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村庄的常态治理与应急治理”(2022MGC06);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重点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022MGC02); 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西部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路径研究”(2023-PP-03);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新模式研究——以昆明大墨雨村为例”(2023Y0993)。

作者简介: 邵凯欣(1997—), 女, 云南曲靖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通信作者: 李明辉(1982—), 男, 云南曲靖人, 讲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the times.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farmer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germination, awakening and foundation, accompani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derlying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 policy. After the germination stage,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level has turned into the "catalytic element" of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thus building a complete and sustainable new farmer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t present, the vast majority of farmers in our country are just in the germination stage,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ecological morality are cru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he new farmer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logic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其中的农民群体在很早时候就有着一定的生态文明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意识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生态文明再次成为关键点。我国的农民群体作为生态文明的直接接触者，也在顺应时代变化的过程中演变出了具有相对较高生态意识的群体。新型农民也称新型职业农民，在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较高素质和一定专业技能且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农业从业者^[1]。新型职业农民本质上属于农民，既不是靠工资收入的农业工人，也不是凭借资本获得收入的农业投资人或农业企业管理者。新型农民在生产活动中有着重要地位，更能够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努力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新型农民在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的过程中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有学者对我国中东部地区“空心化”程度较低的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2]，最终证实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部分学者则认为生态文明和农民收入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呈正比的，并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3]，从而得出直接结论，即经济收入和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建立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但进一步的理论验证研究还不足。还有学者认为个人素质的提高也对生态意识有着一定的影响^[4]，随着我国公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既往研究为分析农民群体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但缺少农民群体生态文明意识生成

的底层逻辑研究，使得生态意识的出现成为研究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附属品，忽略了生态文明意识的能动性。

本文将从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逻辑和底层逻辑入手，分别从个人和国家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参考多方面的文献和实地访谈取得的资料，分析在新时代影响下，新型农民生态意识构建逻辑的根本原因，并探讨可以进一步强化生态意识的方法对策。

一、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基础

新型农民作为新时代产物，这个过程其实是被动的，其对当下农业经济发展的适应加速了生态意识的觉醒。自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发展路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要求后^[5]，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一) 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民生态文明认知基础

新型农民作为有着较高生态文明意识的群体，其意识也会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实地探访可以发现，在一定地区的新型农民都会选择相对封闭的农业活动，承包土地较多的在其土地范围内有着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不仅能基本满足日常所需，还能够自觉维护和改进这个生态系统。根据抽样访谈的调查结果可以初步得出，这些新型农民对生态文明的认识程度基本停留在初级的小型生态圈中，且对自身的小型生态圈有着较高的保护意识，一旦超出生态圈的范畴就只会被动遵循基本的村规民约或者生态保护相关法律，不存在主动、自觉的意识逻辑。

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教育水平限制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导致了农民自我理解能力有限,相对的也会限制国家和其他外部生态文明教育的来源和落实程度。当下我国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具有局限性,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农民群体对生态文明认识的局限性。

在新型农民培育初期,对生态方面的问题认识仍有不足,并不会刻意关注生态发展情况,更没有建立起“生态圈”^[6]。这一部分群体所呈现的共同点就是基本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优先提高经济水平成为他们农业生产的目的,在物质基础得不到满足的前提下,生态上的精神享受也不复存在,他们虽然也对生态有初步认识,但这种意识并没有体现在生产活动中,并且没有在短期内形成系统性的意识体系。

根据多位学者的调研结果和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出,我国农民在生态文明方面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农业生产盲目^[7]

访谈对象中有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一边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在生产过程中滥用农药化肥,农业污水随意排放,生活垃圾随意处理;一边盲目跟风种植方式,不考虑因地制宜,不仅破坏当地的土壤水平,农作物也会有大量农药残留。这样的群体尚未形成生态意识,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很少,无论是说服管教还是法律制约都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

2. 受教育水平低

在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达91.8%,其中未上过学的人占比达6.4%^[8]。虽然农民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升,但相比预期仍有差距。由于认知水平局限,导致这一群体虽然有着生态意识,却存在认知缺乏和失位的问题,他们对生态系统的维护有着自我利益前提,无法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预期,针对这一群体加大宣传力度和法律执行力可以很好地促进其意识完善。

3. 生态责任意识淡薄

责任意识主要体现在主动性和自觉性方面,这一群体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态意识,却无法将其应用在所有生态相关的场所,并形成长期机制,他们认为生态保护的责任不会也不应该落

在自己身上,只是作为生态系统的接受者存在,虽然会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但不会有实际贡献,针对这一群体往往会采用加强教育的方式强化其责任意识。

总的来说,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建构可以从生产、教育、责任三个方面起步,逐步建构起完整的生态文明意识,对于目前仍处于生态文明意识培育阶段的新型农民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 基于新时代生态观的逻辑基础建构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要求,可以将新时代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内涵与要求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1. 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坚持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社会对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也提出了更加丰富的要求。新型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也要注意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重视不同的生态环境对整体系统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减少对周边环境的破坏;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形成保护意识,尊重不同生物群落的生存权利;对农田有着基本的属性认识并能做出相应的处理;坚持保护基本农田和永久性农田,正确把握生态系统整体和生态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农业活动的过程中强化农田治理意识,为改善整体环境做出应有贡献等。

2. 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维护

新型农民要正确处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培养,树立正确发展观,不能一味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要多从整体农产品收益下功夫;加快农业结构转型,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附加价值,改进生产方式,保障生态系统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要树立大局意识,从整体考虑,对生态文明有着明确认识,能够自觉加强对自身生态道德的培养。

3. 对生态系统持续性的保护

针对我国的生态系统底子薄弱、起步发展慢的情况,作为新型农民,最直接接触生态的部分人群,更应该重视生态系统的建设与维护工作,积极主动促进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在农业活动之初就有一定的规划,有长远眼光,做到不破坏、

小影响；在生态意识方面加强自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把握政策要求，能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将环境保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新型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的内涵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其构建逻辑也是一个多角度相互影响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其内容的丰富性，要求的不确定性和时效性。

二、我国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过程

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最初的产生到最终的完善形成体系，也遵循着事物的发展规律，有着其底层逻辑和框架结构的搭建过程。

（一）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

从伦理学角度进行分析，人伦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就是生态道德^[9]。表示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导致了生态道德的出现，这便是生态文明意识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社会结构的改变，经济水平的提高，生存环境的变迁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会改变个人的素质，并且道德作为一种可以进行积累和“遗传”的抽象事物，在整个发展进程中是逐渐上升的，也就是说，道德即个人素质会随着社会进程的螺旋上升而一同上升。

自我国商周时期“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形成以来^[10]，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强调人在自然界中与自然直接协调发展的理念。这些思想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傣族人对山川河流等生态景观的统一认识；蒙古族人将天作“父”，地作“母”，强调了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和反哺之情；在其中还有着“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念，认为在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是有灵性的，我们需要自觉的去保护它们，并使用一系列神话学说和禁忌规则在形成制约^[11]。这些都是早期生态文明意识形成的体现。

历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人们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自然发展规律，其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极具指导意义，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仅表示肯定意见，也强调了人与自然还有着相互成就、相互制约的关系。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提

出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科学论断。再次强调了生态文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我国社会文明形态在经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成为当下的新时代文明形式的现实。生态意识也从最早的“禁忌制约”到真理揭示，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回溯生态文明意识漫长的发展过程，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人民对生态的认知与改造。这种思想作为当下生态文明意识的框架基础，构筑起不断完善丰富的生态“大厦”。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意识的发展

从我国社会发展角度进行分析，生态文明意识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萌芽、觉醒、奠基三个阶段^[12]。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生产起点较低，价值生产力水平低，对生态资源的利用率也较低，只能选择速度优先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忽视了对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处理，在一段时间的发展过后，生态污染严重，自然环境恶劣，水源、空气质量下降等环境问题开始出现，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一方面是针对稀缺的林业资源进行保护，重视林业发展，推出多项政策，在国内大兴植树造林之风；另一方面是水利设施的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葛洲坝水利枢纽等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在多方共同发力下，形成了对资源的利用和节约的意识，开始倡导节约资源，对生产方式进行转型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党中央将保护环境立为基本国策，开始利用法律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人们保护环境、治理生态环境，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强制促使生态资源利用企业对生产技术进行研发改进。随着一些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的成立与兴起，生态文明意识逐渐在人们心中觉醒，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21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加快，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生态科学发展观的需求日益增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都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两山

论”的提出,我国的生态文明意识最终发展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一部分,也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三、对新型农民生态文明观的底层逻辑塑造

生态意识形成过程虽说可以随着生产与环境的相适应而逐步建构,在自然规律的推动下农民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生态意识,但当下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日益迫切,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与完善也是争分夺秒。因此,对于新型农民生态文明意识底层逻辑的塑造与构建至关重要。

(一) 国家在意识层面的塑造

揭示事物的底层逻辑,即从事物的底层、本质出发,寻找一种正确指导实践、解决现实问题路径的思维方法^[13]。生态意识底层逻辑具有的抽象概念不单独存在于某个个体上,而是一种集体思想的引申,或者某种意志、导向的体现,因此构建起新型农民生态意识的底层逻辑也可以概括为国家政策指向和社会发展引导两个方面。

在漫长的意识形成过程中,我国农民受到的最多的影响就是来自国家意识:生态理念的更新推出、对生态保护的大力宣传等。农民作为直接接触生态系统的人群之一,也是国家在场的直接行动者,政策方针的潜移默化逐渐将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在公民内心,方向上的指导也在助推最初意识的诞生。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在政策上对生态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也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农业发展转型升级,在学者研究案例中,“生态农文旅”和“水美经济”^[14]都是明显的政策支持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景象,通过对当地优势环境资源进行充分利用以促进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所带来的整体环境的改变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规约,从而对当地农民的生态意识构建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社会发展引导方面,我国做出的努力更是长远持久。从生态保护标语到当下新媒体宣传,逐渐在全社会形成良好风尚,进一步构建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农业转型升级”等具有多元素融合特点的生态价值观念。在这样双重影响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准确抓住未来发展走向的新型农民在主动

和被动的状态下逐步构建起了自身生态意识的底层逻辑,并逐步觉醒,形成现在所具有的生态文明意识体系,并且这种影响和转变也将持续下去。

(二) 个人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

国家意识的干涉,成为整个生态文明意识搭建过程中的地基,支撑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规约性”。与此同时,个人意识的觉醒便成了这座“大厦”的砖块,最终沿着框架将其塑造成完整的逻辑框架。虽然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才被提升到大政方针层面的,但意识却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人类作为社会的缔造者、生存者,生态的参与者、接受者,任何生产生活活动都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只不过有一部分人预先察觉到了未来所造成的不良结果,另一部分人只顾眼前。新型农民便是能够察觉到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人群之一,虽然个体之间的效果差异明显,但在研究过程中这个变量就成了关键——因为新型农民能够比其他群体更先产生生态文明意识。

有学者通过“农民生态文明心理素质调查问卷”,从各方面对当地农民的生态知识和生态行为进行调查,得出的结果可以大致上认为农民群体的生态认识普遍较低,并且没有好的生态教育和引导^[15]。在教育引导之前几乎所有农民群体都处在相同水平,一旦受到了国家政策和当地政策的影响,受到教育培育的新型农民群体就能快速建构起相对较好的生态文明意识。通过分析探访群体的共同点和其他基本信息可以得出,新型农民群体在农业结构上和其他农民有着很大的不同(少部分农民农业结构正处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新型农民对农业结构的调整是在承包土地初期经过设想、规划的,并没有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属于自主行为。因为在脱离通过基本农耕满足生存的情况下,他们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更大的产量和便捷的生产方式,这种思想在经济相对困难的农民群体中也有体现,但由于并未接受过系统、完备的生态理念相关教育,他们并未意识到其中和生态的深层次联系。

在有了国家意识作为支撑的先决条件下,个人意识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生活成本的提高而被逐渐完善,对高标准高收入的向往,对和谐生活的追求,导致他们在国家的引导和培育中走上生态文明道路,并逐渐认识到生态意识。

四、结束语

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道路,就需要每个人有构建培养正确的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加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作为具有一定时代色彩的新型农民虽然在生态文明意识方面因为多种不同的原因而存在偏差,并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无论其具体呈现状态如何,在构建过程中,都是以国家意识的底层逻辑作为主要支撑并结合着个人意识的培育和转变。新型农民群体的产生有着时代必然性,也正因这些新型农民的出现,推动了我国农业绿色化发展道路,也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建设和整体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意识到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抽象的遗传因子,可以在历史发展中延续,更应该意识到政策支持和国家意识指向所起到的基础性力量,以及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自然观念对整个生态意识的框架构建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国家政府更应该注重生态意识的底层逻辑构建,不断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态文明观念,加大宣传范围,扩大影响力。个人要加强对自身意识形态的转变,加强生态教育,强化主体责任,共同塑造一个环境优美、生态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EB/OL]. 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12/12/10/ARTI1355128875845505.shtml?from=groupmessage>
- [2] 刘江翔.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生态文明意识行为的影响[J]. 福建商学院学报, 2022(5): 9. DOI: 10.19473/j.cnki.1008-4940.2022.05.002.
- [3] 胡雪萍, 吕培培. 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农民收入影响研究[C]// 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学会, 扬州大学商学院. 建国70周年与人的发展经济学: 2019年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 16.
- [4] 董甜甜, 马梦鸽, 郑媛媛. 新时代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现状与思考[J]. 法制与社会, 2021(24): 100. DOI: 10.19387/j.cnki.1009-0592.2021.08.196.
- [5]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6] 王献溥. 生物圈和生态系统[J]. 环境保护, 1979(2): 9.
- [7] 李婷君, 董君, 华玉武. 生态文明背景下京郊农民生态文化教育行为分析[J]. 农业展望, 2016, 12(12): 24. DOI: 10.3969/j.issn.1673-3908.2016.12.007.
- [8] 国家统计局.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第五号)[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99.html.
- [9] 罗莹莹. 生态文明背景下农民生态道德研究[J]. 才智, 2015(27): 334.
- [10] 张世英.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J]. 求是, 2007(7): 34.
- [11] 苗楠. 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价值[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23(2): 128. DOI: 10.3969/j.issn.1672-5409.2023.02.027.
- [12] 张永斌. 论对农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的途径[J]. 中外企业家, 2009(22): 232.
- [13] 李丽莉, 曾亿武, 郭红东. 数字乡村建设: 底层逻辑、实践误区与优化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 77. DOI: 10.20077/j.cnki.11-1262/f.2023.01.005.
- [14] 杜焱强, 王继应, 孙雪峰. “生态颜值”何以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10): 150.
- [15] 李萍. 农民生态文明建设的心理状态与对策思考[J]. 中国成人教育, 2018(6): 154.